

The Correspondence of

Hsu Yun-Tsiao

许云樵

来往书信集

廖文辉 曾维龙 纂注

Edited by Lew Bon Hoi & Chou Wen Loong



新纪元学院研究系列④

T7604

许云樵来往书信集

The Correspondence of Hsu Yun-Tsiao

廖文辉 曾维龙 纂注

Edited by

Lew Bon Hoi & Chou Wen Loong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敬赠

With Compliments of

Malaysian Centre for Ethnic Studies (MCES)

New Era College

本书部分出版费用由以下单位赞助：

马来西亚李氏基金

雪兰莪福建会馆

雪隆海南会馆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2006

新纪元学院研究系列 ④

许云樵来往书信集 *The Correspondence of Hsu Yun-Tsiao*

廖文辉 曾维龙 纂注

封面/排版: 庄儒频

出版: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Malaysian Centre for Ethnic Studies (MCES)
New Era College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 03-87392770
Email: mces@newera.edu.my

印刷: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45169-K)
Advanco Sdn. Bhd.

出版日期: 2006 年 11 月

国际书号: ISBN 983-3527-01-9

定价: RM50.00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Xun Yunqiao lai wang shu xing ji]

许云樵来往书信集 = The Correspondence of Hsu Yun-Tsiao /

廖文辉(Lew Bon Hoi); 曾维龙(Chou Wen Loong) 纂注

(新纪元学院研究系列 = New Era College research series ; 4)

ISBN 983-3527-01-9

1. Hsu, Yun-Tsiao, 1905-1981—Correspondence. 2. Scholars—Correspondence.

I. 廖文辉, 1969-. II. 曾维龙, 1976-. III. Title : Correspondence of Hsu Yun-Tsiao.

IV. Series : 新纪元学院研究系列 ; 4. V. Series : New Era College research series ; 4
370.09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 © New Era College, 2006



许云樵传略

许云樵，原名钰，号梦飞，别号希夷室主。祖籍无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生于苏州。父母早故，由外祖母抚育成人。后得亲友资助，先后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和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

许云樵于1931年南渡新加坡，曾先后任职于新山宽柔学校、新加坡静芬女子学校，以及暹罗北大年中华学校。1938年，他辞去曼谷教职，再次回到新加坡，应聘于《星洲日报》，编《星洲十年》。1940年任教于中正中学，是年又与关楚璞、郁达夫、姚楠、张礼千，以及槟榔屿的刘士木、上海的李长傅等创组“南洋学会”。期间任《南洋学报》主编，共十八期。

1957年起，许云樵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之聘，任史地系副教授兼南洋研究室主任。6年后，任满离职，自办东南亚研究所，并出版所刊《东南亚研究》，共七卷，至1971年停刊。1964年，应聘为新加坡义安学院院长室秘书兼史地教授，并负责编辑院刊。1968年因车祸折股断腕，而义安学院又迁址改办为工艺学院，他便宣告退休，时年63岁。

许云樵生平酷爱图书，节衣缩食购置中外图书3万多册，其中以东南亚文献为多。晚年由于左眼失明、年迈力衰而长卧病床，惟有忍痛卖书求医。后经新加坡商人许木荣同意认购，并最终转赠“晚晴园”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许云樵长期从事南洋史地研究，著作等身，蜚声国际，曾被选为英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副会长以及中国学会副会长。除学术文章外，也擅诗文，有《希夷室诗文集》、《文心雕虫集》等行世。于中医药也颇有研究，编有《传统中药展览目录》、《马来验方新编》等。其主要著作除《北大年史》外，还有《马来纪年》、《南洋史》(上册)、《马来亚史》(上下册)、《马来亚近代史》等。

1981年11月17日，许云樵因癌症病逝，终年76岁。

東 南 亞 研 究 所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P. O. BOX NO. 1461
SINGAPORE.

槐準先生：

上信因多於你發，忘了把我存你照的
照片寄上，現在附上共二十四張，請查收。下月
我難能赴法，參加國際樹膠會議，但並
沒有時間給我多留，將不免有如入宝山
空手而還之感，沒有機會給我多收資料。
請代候司徒楚貞、朱傑勤、姚雲可鴻三先生，
稍暇我要寄書給他們。我精神上還
得是緊張的，工作一直幹不完的，生活也一
是不穩定的，也許还会有些不健全，也說不定。
下次再談，匆祝

龍旗

許雲樵
四月十七日

許雲樵手迹：與韓槐準書

序一

李业霖

廖文辉和曾维龙两位青年学者无意中发现了已故许云樵教授的一大摞书信，这实在是很值得庆幸的事。他们付出辛勤的精神劳动，加以爬梳整理，标点注释，编成《许云樵来往书信集》一书，把一个著名的南洋史专家与家人、新雨旧交、门生同事以及各国学者的心灵对话录，奉献给读者们。他们无疑做了一桩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许云樵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南洋研究室主任。他是我的业师。1961年杪，他脱离南洋大学；我于1963年3月1日进入南洋研究室（后来升格为研究所）当研究助理。当时我的顶头上司是加拿大籍的Dr. Fic，不谙华文。研究室的日常工作包括草拟函件的任务，都由我来承担。前主任许云樵留下了两大文件夹的函件，我整理时寓目过了。他的私人函件，我托人交还给他。我当年为研究室起草的公函，吸收了许云樵所使用的公文术语。许教授的公文，表达的意思准确明白，就像当面跟人说话一样，要言不繁，很能把握分寸。

《书信集》选收中文书简共三百多通，英文函件共一百多封，反映了他从1931年至1981年之间的生活、文化活动和思想状况。在治学方面，他有精辟意见，可供后学借鉴。

许云樵曾遇车祸而折足，用功过度，盲了一目，连串不幸，不免向人倾诉苦恼。他给王纪元的信说：“去年来我因家庭负担沉重，经济发生重大困难，以致我对《东南亚史简编》的编写时辍时作，极为缓慢，心中十分抱歉……”词情悲恻，读后掩卷茫然。一个学人家累沉重，经济拮据，心情不宁，触绪生悲，导致精神不集中，怎样研究学问？怎么能冷静地精思苦想，构思文章，写出好作品？一些外行人，不了解著作的甘苦，一味求快，要限期完成，不断催稿，抱怨人家进

度慢。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速成文化观，对于学术研究或文艺创作都不利，恐怕会导致“一代文化有厄”。

许云樵一生清贫，洁身自爱。为人耿介，勤于治学。他才高通古，但性不宜今；一身傲骨，惟乏媚容。像他这样正直拘谨又不从俗的人文知识分子，必会遭遇诸多挫折，临大事往往徒叹奈何。

许云樵在文化领域贡献很大，尤邃于新马史的研究，攀上了光辉的高峰。但命途多舛，李广难封，他有句诗云：“读破万卷书，不如贩夫优”。抒发了读书人胸中积郁的不平之气，道尽了如司马迁所说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见《报任安书》）的民间学者的悲哀。像许云樵这样的学者，对社会有卓越的贡献，但不获社会的同情照顾，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深幸有一，不期有二。他对南洋史有高深造诣，对人文科学有渊博知识，这是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提供了条件，他“鸡窗苦读四十年”的不懈努力，造就他成为罕见的专家。现在社会新一代，不容易取得他那样的成就。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1835 - 1901）说：“人的心灵活动中，最坦率、最无拘束、最秘而不宣的成果要算情书了。写情书的人深知别人不会看到他所写的话，从而表露心曲时可以无拘无束。”

揆诸事实，岂只情书是表露心曲的载体，一切书简都是披露心迹，实不藏情的文章。真情挚语，都出自肺腑，交流思想情愫，述怀陈情，甚至辨析事理，都是书简的主要功能。这就是书简文学的特色。

通读许云樵的简牍，我们可以了解他的生平志行，思想感情状态，学术见解，人生哲学和处事方式。阅读许云樵的书信，我们可以窥视他的内心世界和通讯世界。他与国际一些名学者有书翰来往，包括研究本地历史的学者如：K. G. Tregonning, Mubin Sheppard, Paul Wheatley 和 J. I. Miller 等等。

许云樵博闻强记，文章尔雅，是新马学坛一枝笔。他著作等身，从

煌煌巨著到袖珍小册，一共30多种。读过他“述往事，思来者”的历史作品，不妨再读他的书简，或直言叙事，或含蓄规劝，或严肃论学；或求人帮助，委婉陈情，不亢不卑；或披露心曲，倾诉苦衷，说明自己处境困难。他的这些书简，令你兴味盎然，并从中获得启发。谨缀数言，以为序。

2006年8月24日·华研

序二

廖文辉

简牍书信，鱼雁往还，自古即是文人雅士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然信笺之文字遗存较之诗词歌赋的创作，无异以末节小道，难登文学大雅之堂。虽然如此，书简的魅力始终未减，成为文人私下往来，却又不发表的创作。这些书信的内容，小至个人私谊之互通衷情，以至族中家事的嘱咐叮咛，乃至国家天下的兴废存亡，林林种种，不一而足。这些书信拈指数来就有：多尔袞的<与史可法书>、史可法的<与多尔袞书>、曾国藩的《家书》和《家训》、林觉明的<与妻书>等，皆能传颂千古，为世所称道。所以好的书信不仅能雅俗共赏，并且还是传世的文学著作，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史料。书信既然是极之私人的文字，其得以曝光面世，重见天日，往往已是当事人身后的事儿了。

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已编印行世，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自近代以来，书信集的收集、整理和出版，蔚为一股风气，如《胡适书信集》、《两地书》、《蔡元培书信集》、《陈垣来往书信集》，乃至近来的《宋庆龄书信集（续编）》、《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等等皆是。书信在文学家眼中，无疑是具有一定的文学欣赏价值，但对一位史学家而言，却是富有史料价值的文件。自从1902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口号，史学革命已隐然成形。新一代的史学家已经不能满足于传统的文献史料，举凡一切的器物、地下考古、档案皆可为重要的史料，书信既为其中之一。书信作为文献资料，其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一窥学者们的日常细微之生活琐事，而这些在一般的学术论著中是难于见及的。例如从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书信，很清楚地看到他如何为贫病所苦，绌于钱财。类似情况在许云樵的来往书信时有见及。有些学者著述等身，但从来吝于片言字语谈及其学术生命以外的生活、家庭，甚至年少成长的岁月。这只有依靠其日记和书信，许云樵庶几当之，他不写日记，幸好他有意识的将书信保留了下来，使吾人能以学术著述之外一窥其个人之生活细节以及家庭生活。

许云樵书信资料得以保存整理，实在是天不欲丧“斯文”而侥幸得存。许云樵在身前已将一批为数三万册的藏书以高价脱售于木材商人许木荣。另外，许云樵没出售的文件、书信、手稿、部分藏书，则在其身后交托福建会馆保管。岁序2000年，福建会馆要装潢整修，许云樵之部份藏书、书信和手稿被遗弃，散落一地，几同废纸垃圾，有者甚至可能已遭遇不幸了。后来，新加坡的藏书家庄韦天、民间学人关瑞发和古物收藏家洪炎正先生等人慧眼独具，将满地的书信和手稿一一检回，并将之存放于储物箱中，这批珍贵的文献才能幸免于难，得以保存。保守估计约得书信四、五百封，手稿数十份，另有许云樵点校的清史稿影印本一份、各类国际研讨会论文、水电单据和照片等，不一而足。

(二)

2003年年中，在一次偶然的机，中文系同事曾维龙与笔者谈起这批资料，脑筋马上闪过何不加以编辑整理出版的念头，因此即刻起草计划书，向院方申请研究经费。另一方面，也透过维龙向庄伟天接洽。就这样《许云樵来往书信集》的计划如火如荼地展开了。2004年元旦，我们一行三人南下新加坡整理并影印资料。由于许云樵的书信收藏于洪炎正先生家中，他的住家也同时是古物收藏的仓库，偌大的房舍，四处堆满了洪先生张罗和收购回来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收藏品。房子虽大，但空间却少。我们三人攀高爬低地将许云樵的文件资料逐一移出，席地而坐，在仅有的空间，将十个抽屉的文件资料，从中拣选出许云樵保留和珍藏的书信，至于其它的手稿、图片等资料，则进行简单分类，然后装袋归回原位。披沙拣金挑选出来的书信，则装进一早备好的透明胶袋，并将这分量不轻的书信带回庄先生家中。第二天早上七点即开始进行粗略分类，并将这些脆弱、泛黄的书信小心翼翼的加以影印，尽量不使损伤原件。马不停蹄忙到了晚上七时，总算大功告成，将书信拷贝一份，原件仍留庄先生处，只带回备份，并将之另行复印出第二套备份，我们就以第二备份进行编辑校注的工作。

书信集的编辑工作主要依据如下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是选编。从保存资料角度出发，收录的范围是尽量放宽，家信和学者可说是照单全收，来者不拒，甚至有者残缺不全，只得全信之部分，皆予收录。因

为我们的原则是，凡是对了解许云樵和马新南洋研究的学术发展情况有所助益的，皆在收录之列。约略鸟瞰所收集的书信后，发现书信类别十分繁杂。在语文上涉及华、英两种（另有几封疑为印支半岛国家语文的书信）；在体裁上公私函兼有，其中有部分乃法庭或律师来往信函；在书写对象或作者方面，有家人、学人、后学以及国内外之学术团体、机构，这无疑增加选编工作上的难度，委实费煞思量。在全盘掌握和全面了解书信的基础上，我们拟定如下的原则，首先以语文作为选编的第一位序。其次，在各语种书信的处理上，据内容和实际情况又有不同。中文书信约有三百余通，是书信的主干，依据作者的性质再分成五大类，即家书、学人、一般信函、公函和法律函件。家信乃是与许云樵有血缘亲属关系者，共20通；学人信函则采用广义的分类，举凡文化人、报人、作家皆归入此类，不只是局限于学院派的学者，也是所有类别中分量最庞大的部分，共225通。一般信函主要是指未能纳入其他类别的，共59通；公函则顾名思义主要是以机构单位为对象的函件，共40通。另有一类为法庭与律师信函，则以专题方式处理，分车祸事故和字迹鉴识两部分，分别为6通和15通。至于英文书信则不进行分类，仅依据作者和单位的汉语拼音排序，共119通。

至于在书信的编排上不外两种办法。一是按各信的时代先后编排，一是以人物为单位编排，这两种编法，各有优劣。按各信时代编排，较容易让人掌握发展脉络。缺点是，各个通信者与信主的关系不一样，有的是长辈，有的是朋辈，有的是晚辈，有的是家人，所以口吻、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果有来往或相互问答辩难的书信，采用第一种办法，则有割裂的问题。因此，尽管第二种办法有时间顺序交叉的缺点，但我们还是选择了后者，那是因为大部分的家信和学者都有数封以上的来往，单封独篇的较少，如果摆放一起呈现，较能看出许云樵与学人的互动关系。英文书信方面由于绝大部分的作者都相当陌生，为免分类错误，我们采用了第一种编排方法。

其次是送打，大部分书信皆以行草，甚或草书来书写，连续接洽了好几家打字社，皆望而却步，不敢接手。最后只好土法炼钢把系里学生组织起来，由学生负责输入，实在难以卒读的书信，只好自行或寻求娴熟于书法的书艺家代为认读誊抄后才进行文字输入。

第三是校注。前两校先由学生边打边校，第三校开始才由维龙和笔者负责。这是编注工作中难度最大，问题最多的部分，远远超过了事先的估计。横亘于眼前的难题首先是文字的辨识。学生在边打边校的过程中已读解出少部分，接着是由维龙和笔者设法解读，在边作边学的情况下，不时就教于本院有多年书法研习经验的人事处主任梁健林先生，加上获得尊孔独中美术老师赖忠祥先生及其恩师贺金泰先生的首肯，答应协助解读我们无法辨识的文字，期间谭家键教授也再这方面给予我们不少的协助。就是这样来回往复，不厌其烦地努力下，终于将大部分的文字解读出来。当然有的字迹非常潦草，实在无法认读只好作空框了。至于部分文字依据上下文推敲斟酌，不敢确实肯定，以〔 〕标示，以示不敢自专。

复次是句读的问题。与许云樵过往的大部分皆传统文士学人，部分书信甚至以毛笔挥就，全无标点，为方便阅读，不得不勉为句读，但限于学识水平，难免错读，断句不当。所以皆会在信件抬头处注以 * 符号，以示此信之标点乃编者所加。再者则为作者署名的考订。许多来信人只署名而无姓，可能是知交或老友。有些署名极度潦草，甚至有类似画押者。有者在学界名满天下或薄有名气，不难推寻其姓氏，余者则尽量结合书信内容、字迹加以判断。其名姓实在无从考究者只好作罢。

再来是信件时间的考订。大多数的信件有月日而无年份，甚至难于辨识者，这里只好寻绎信件中的内容来考订信件年份，并注以“约某年”，以明此乃编者事后考订，并非原信所有，并于注解中说明考订的依据。所幸在编注书信集之前，编者已撰有《许云樵学行年谱初稿》四卷（未刊印），部分年份得以据此底定。由于信件数量多、时间长、牵涉面广，许多年代仍无发考出，已考出者也难免有错，这也是需请教高明的地方。

最后是注释。有一些信件提及的人和事，对许多人而言可能不甚了了，特别是后世的人。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书信，编者尽可能加以必要的注释说明。一般上注书大要不出两派，一注本事、一注训诂典故。这部书信集主要作本事注。首先是尽可能对每一位通信者

作一生平经历的简介，同时也尽可能说明通信时的情况及其与许云樵的关系。至于无从查找者，只好存而不说。这一方面马岱的《马华作家扫描》、柯木林的《新华人物列传》和网络为我们扫清了大部分的障碍。其次是对信中提到的人和事作说明。目的在于尽量使读者对信的内容及背景有更精确的了解。最后也针对一些可能会困扰读者阅读的特殊字眼加以注释说明。至于其它人名、书名、地名等专有名称有需说明者，编者也斟酌注释。

此外，另有约三十封迄今仍无法辨识其确实名姓和日期者，同时其内容大部分也来不及认读者，由于出版在即，时间紧迫，只好暂时割舍，以待来兹。在工作分配上，全书的体例格式，书信的类别、注释和考订主要由笔者规划、架构和处理。维龙则负责使用电脑进行书信的整理、排序。至于校对和认读的功夫则由我们二人共同进行。

(三)

从许云樵庞大的书信收藏量，以及他以复写纸作为去信和回信的底稿备份来看，他是有意识的保留他本人书写的书信和他人的来信。其中有一批是许云樵黏贴在自制册子的珍贵特藏书信，大部分为1930年代的书信，涉及的人有叶华芬、陈育崧、日比野丈夫、韩槐准、司徒子襄、李长傅以及报馆和杂志社的来往信函，看来这批书信是许云樵极为看重的。他的书信字迹清晰，绝少涂改，可见是事先拟好草稿，然后才正式誊写。大部分的书信因为年代久远，纸张发黄，变得干燥易碎。相当大部分的来信皆有信头，如：东方舆地学社、暹罗华侨日报、暹罗中华总商会、逸经社、东方杂志社、教育杂志社、星洲日报、India Council for Culture Relations、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等等，不一而足。从这些信头大致可窥见他与国外多个学术团体或机构有相当的联系，并且参与多个学术社团，可证其学术活动和交友之广阔。信的内容包罗万有，从学术讨论、庭训教诲、就教释疑、嘘寒问暖以至闲话短长，皆有触及，当然其中内容的价值就不免高低互见了。涉及的人有学者、学生、儿女、亲友，不一而足。

翻阅这些信札，它提供我们在其著述以外另一个了解许云樵道德

文章的管道。因此，这项工作是别具意义的。第一，它为我们了解许云樵，提供了一份极其宝贵的材料，在某些方面，它是别的材料所无法替代的。例如在许云樵年谱的编写方面，某些事件和年份可据之考定，同时它亦可补充年谱的资料。第二，它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去了解“南洋研究”时期的学术发展情况，同时也可视为马新学术史料之一。第三，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子邮件大行其道，传统的书信沟通似乎渐行渐远，由于电子邮件具有易以使用，快捷便利的特点，即使是年老一辈亦逐渐屏弃书函往还，改以电子邮件为通讯的方式。这种沟通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随读随丢，少有留存。不免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就此遗失，了无痕迹，实属可惜。针对学人书信的整理和出版，将可一窥某个时代的学术和风气。因此，在21世纪资讯社会的大时代里，仍然能有机会出版书信集，是非常难得的，随者老一辈学人的相继故去，往后要出版书信集，可以想见，会愈来愈少。

(四)

许云樵是我学史路程上其中一位极为敬仰的马新学人，也是心仪的私淑老师。回首这两年多的搜集、整编、校注工作，真是百感交集，现在终于交付出版了，算是为前辈学者稍尽绵力，为学术遗存做点“厚积”的工作。斯书得以出版，是结合众人之力，尤其是新纪元学院中文系的多位同学翠云、秀华、月玲、翠艳、薇丽、婉仪、胤怡、家敏、伟森、乙颖等等。没有她们荦路蓝缕的输入、誊写和校对工作，这本书信集是不可能面世的。此外，也要感谢李永球先生在我们工作过程中所给予的宝贵意见。最后，雪隆海南会馆、雪兰莪福建会馆和李氏基金在出版经费上的慨以将伯，在此也一并致谢。

谨以《许云樵来往书信集》的出版，弁言数语以为序。

稿于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2006 年 6 月 30 日

序三

书信的发现、整理与出版

曾维龙

大约在四年前，因缘际会，我在柔佛州新山的陶德书香楼中认识了庄伟天先生。当时我的太太罗彩绵在那儿短期性地帮忙庄先生整理书籍资料。与庄先生开始深交，便是与他交谈本土的书籍文献，本土文史材料的状况开始。

从那个时候起，我深刻地意识到新马两地的原始史料，在前辈们有意识的收藏保护下，散落在不同地方，并且有许多尚未及时整理和出版。其中就包括今天我们所整理的《许云樵来往书信集》中的手稿文章。

庄先生向我提说许云樵这一位新、马史学大师，指他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挖掘的重要人物。可惜在过去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本土的华人研究大都集中在华人社会和国家政治结构变化过程的现象解释及分析，致使文史的研究也都倾向于社会科学的框框之中。我们的媒体和思想界对于许云樵的成就显然关注不足，除了专门从事南洋史地研究的学者外，许云樵的名字在新一辈人的脑海里几乎印象全无。

然而，仔细挖掘过去，我们就会发觉到许云樵不仅是早期南洋研究和本土史地研究的权威。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他同时还从事很多学术普及化的工作。譬如主编《马来亚少年》，这是一本适合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的知识性刊物；以及在报章上勤写专栏文章，将他在学识上的发现和观察，向当时新、马两地的华文社群推广和介绍。此外，1986年以前所应用的中学华文课本中，许多有关马来亚的史地介绍和典故文章，也都是大师的手笔。许云樵在当时所扮演的无疑是先锋的角色，对于早期新、马两地知识界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

职是之故，让许云樵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中淡忘、遗弃，无疑是一种遗憾，同时也是对本土学者的尊重不足。因为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我们今天对于本土文化的根，不至于显得贫瘠无知。

再者，如果我们翻阅早期一批学人所留下的文献、刊物，看看他们在报章上所发表的文章言论，就会看到这一些学人的知识广度和思想深度。尤其在新加坡南洋大学还没有遭到关闭的期间，华文的论文研究论述，水平之高，在国际的汉学界颇受认同。许云樵更是南洋史地研究的一面旗帜。吾辈们踏在大师的肩膀上，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才得以继续前进。

因此，今天得以整理和出版许云樵的手稿书信，不仅是我个人的荣幸，同时也是前辈们不厌其烦，人弃我取，对无人问津的残缺纸张逐一捡拾收集起来的成果。

× ×

× ×

× ×

在与庄伟天先生交流以后，得知洪炎正先生收藏着一批许云樵的手稿书信。随后我便提出，应当将这一批书信整理后付梓，在与同仁分享之余，同时也希望藉此向社会群众重新介绍许云樵其人。这也是与他们两位老人家交谈后，所拥有的共同心愿。

尤其在我第一次和庄先生共同前往洪先生在新加坡的住所时，触目所及的便是洪先生屋子中许多为人所遗弃的物品，譬如一个成旧的水磨、已经被淘汰了的一些机器等等，相好无缺地拥挤在他的贮藏屋中。没有整理，也没有漂亮的装潢，但俨然就是一个小小的文物馆，可以看到前人默默耕耘所留下的沧桑痕迹。而洪先生本人只是占据屋中小小的房间而已。我看了，打从心底涌起一份感动和一份敬意。

当时与我同去的尚有一位朋友徐威雄。他本科是历史专业，当时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博士研究班。我们在那儿一起翻阅了部分许云樵的手稿书信后，最后得出的结论这批原始手稿相当珍贵，应当提供更多本土研究者共同分享。如果再稍微迟疑，部分已超过五、六

十年的书信纸张，恐怕再也耐不住时间摧残，破损益多。

尔后我将部分的手稿带回学院，交给我的另一位同事廖文辉，以及当时在学院任研究中心协调员的陈美萍小姐。文辉本人不仅是历史专业，从事本土史地研究的工作也有相当的一段时间，许云樵研究恰巧正是他努力发展的领域之一。

我和文辉畅谈以后，便决定向学院申报，两人共同提出这项整理和出版计划。当获得学院批准后，大约在2004年初，我、彩绵和文辉再次前往新加坡，将该批手稿书信进行了初步整理，并影印了一个备份，往后的编纂工作便是在学院进行。本人承蒙不弃，在编辑和整理的过程中，从中着实吸收了不少经验。书信中诸多早期从事南洋研究的学人，大部分均由文辉考证作注。本人在此不敢居功，仅在编辑校对、档案整理方面负责较多技术层面的工作。期间个人尚有许多失误之处，也由于他的包容，最终顺利将此书出版。本人在此也要向我的这位同事致歉，因为由始至终他都以同侪共事的原则，而非以辈分资历之深浅，始终与我共商和面对此书的诸多问题。

最后，感谢新纪元学院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也感谢所有曾经给予我们意见，以及帮助过我们的人。谨以此书奉献给所有从事本土研究的前辈们，以为序。

初稿于2006年3月19日，寒舍

修于2006年4月25日